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审计机关还应大力拓展反腐空间

据审计署网站消息，近日审计署对2014年工作作出部署，2014年将组织实施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等经济责任审计。今年审计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紧紧围绕反腐、改革、发展，努力实现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审计监督全覆盖。

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机关肩负着维护财政经济秩序、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等重大职责。审计机关不是专门查处腐败案件的部门，但应当而且能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

在对高级官员和央企高官的经济责任审计中，审计署拥有的技术优势，可以在反腐斗争中发挥突破性作用。任何贪污腐败分子的活动都是围绕金钱、利益展开的。再狡猾的贪腐分子，多半也会在财务报表、会计科目等方面留下蛛丝马迹。审计人员在财政财务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审计部门作为职能部门还可以获取很多数据，专业的数据比对可以帮助审计机关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贪腐线索。审计机关的专业分析，有利于从制度上反腐，从源头上打击腐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落马，就是源于审计署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审计署在对高铁建设的审计中，先是从施工企业的一笔款项追踪到女商人丁书苗，最终让刘志军浮出水面。

目前正值我国反腐败“打老虎”的关键时期，在办好个案的同时，更要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反腐败制度。一个成熟、完备的反腐败制度体系，离不开拥有“技术优势”的审计机关。当前，审计在履行反腐职能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首先，工作中审计机关受到地方保护的干涉过多，导致审计工作难以实现独立性。其次，审计机关有时会遭遇被审计单位隐瞒、拒绝提供资料，甚至是恶意销毁会计资料等行为。

如何落实审计机关的反腐作用，如何有效拓展审计机关的反腐空间，是我国反腐败制度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与审计机关需要加强配合协调，实现优势互补。审计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案件查办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必将凝聚反腐合力，推动建立更加完善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4年2月22日《北京青年报》樊大彧）

公平正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改革开放初，我们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并且明确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策略选择。然而，不可否认，社会利益已经开始急剧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已经形成，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公正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突出。如果继续坚持“效率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的原则，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长远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把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个实质性的飞跃。怎么理解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先看改革的出发点。把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按照公平正义的标准来寻找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破除损害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障碍。再来看落脚点。把公平正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就是要按照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在经济、政治、司法、文化、教育、环境等领域设定一个个具体的改革目标，并且按照这些具体的公平正义目标来建立和健全各种体制机制。

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利益的分配。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际情况来看，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而导致两极分化。然而，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的经济公平外，还必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接受法律保护等权利。

当然，“公平优先”并不意味着不讲效率，相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极其重视效率。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对效率的肯定和重视。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说不应矛盾，因为它们的作用各有侧重，效率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生产，而公正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分配。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维护公平正义，讲的就是既要效率，又要公平。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社会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

总之，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中国有句古话，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对于公平和效率，我们应当两者都要，要“鱼和熊掌兼得”。既要公平，又要效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策略选择。（2014年2月19日《新华日报》俞可平）

◆纵 横

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下最流行的歌曲恐怕非《时间都去哪儿了》莫属，作为电影《私人订制》的插曲，先上马年春晚、再上元宵晚会，加之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也有提及。一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由流行歌演变成了流行语。

《时间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会这样火？我认为是朴素的歌词戳中了大家的泪点，触摸到人们心底那根最柔软的弦——对温暖亲情的回忆与期盼，更重要的是激起每一个忙碌的人对时间易逝的无限感慨。

这是一个竞争加剧的时代，也是一个节奏加快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奔波，“忙”已渐成一种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一种人际交往的浮躁“时尚”，一种疏于亲情、懒于学习的托词。不经意之中，时光悄悄流逝，顿生感伤“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真的很忙吗，我们的时间到底都去哪儿了？有的人忙在床上，喜欢睡懒觉，一有空就睡个昏天黑地；有的人忙在网上，俨然“屏幕人”或“键人”，让大把的时间从指缝间滑过；有的人忙在“场上”，不是在牌场上玩就是在交际场上混，赶了一场又一场。当然，由于交通拥堵，很多人的很多时间也花在了路上，不是在上下班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这就需要加快建立方便市民出行的发达、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来渐进纾解，以给市民腾出更多的时间。

时间，是一个人生命长度的量度，也是一个人生命质量的维度。看一个人的品位与层次，不是看他的职务高低，也不是看他的财富多少，而是看他的时间花在哪儿。一个人沉溺于吃喝玩乐，他的境界不会高；一个人热衷于看书学习，他的素质不会低。时间该去哪儿？既要花在板凳上，也要花在田野上。“板凳要坐十年冷”，要狠心学习、静心思考。习近平主席说：“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每一个人都把时间花在工作和学习上，实现个人的梦想和中国梦也就指日可待了。同时也要常坐“热板凳”，有空陪陪亲人，享受家的温暖。

时间在希望的田野上校准、延伸。每一个人都要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不虚度光阴；作为官员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工作做到田埂上、把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每一个人都要重视健康，无论多忙，也要抽空到公园里健健身，到田野上走一走，以延伸自己时间的长度。

人们对于“时间都去哪儿了”的集体忧虑背后，其实是对自己浪费时间的深深自责，也是对如何管理好时间的迫切期待。把有效的时间花在有用的事情上，我以为需要“时间文明”和“时间智慧”。所谓“时间文明”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时间观念、效率意识。要“识时、惜时、守时”，要有马上开始的雷厉风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日清日结的良好习惯。所谓“时间智慧”，就是要善于利用和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在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的当下，要懂“计时”，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规划安排好时间表；要善“集时”，把零散的时间集中起来做好一件事、做成一件事；要会“挤时”，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还是有的，车上、枕上、厕上的时间读读书未尝不可。（2014年2月15日《长江日报》方言）

◆评 论

政府要有亮出“权力家底”的自信

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晒出“权力清单”，其实就是简明地向民众公布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及其范围。当然，晒出“权力清单”，也是为了方便政府官员时刻记住“权力的笼子”边界何在，从而实现他律与自律的整合。面对“权力清单”，政府照“单”做“菜”乃是正常履职；超出“清单”行使公权力，那就是越权、滥权，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些专家指出，我们国家长久以来在行政审批权上存在“家底不清”的顽疾。因此，亮出“权力家底”才显得别具意义。事实上，作为客观存在的“家底”晒与不晒都在那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所有的政府权力都应来自于法律的授予，而法律必须公开，不然就不成为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多少法律，白纸黑字均有据可查。这就是政府权力最基础的“家底”。在文本上，“权力家底”当然是清楚的。

往下看，国务院及其部委基于法律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也应当是清楚的。不然这些法规与规章何以推行？民众感觉公权力不清不楚，其实多不在“家底”不清，而是多年来民众对法律和规章的参与度不足，加之法律法规的专业壁垒越来越高，从而导致了普通人对政府“权力家底”的疏离。

而今国务院主动将颇显抽象的法律授权具象成“权力清单”，对于民众便捷地掌握政府的“权力家底”自然大有裨益。有了这一基础，对政府履职的监督才谈得上有的放矢。

政府不能出于私心，而将公众阻挡在信息壁垒之外；政府也不能以法律已经公开为由，拒绝晒出“权力清单”。政府有义务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自己，这是单纯为了方便民众，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公权力不逾越法的边界。从湖南试水晒出“权力清单”以来，其他省、市的效仿时有所闻。但由于这种晒并非出于法律要求，也无责任机制殿后，因而全凭各地政府主要官员的重视程度。这也使得地方政府亮出“权力家底”行动虽不乏可见，但离民众的期许和要求，应该说仍有不少距离。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对此有明确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晒出权力清单，已由之前的地方自发推进，走向了自上而下的推广。期望国务院的上行，能够迅速带来各地政府及其部门的下效。

晒出权力清单，让官员和民众看到这个笼子的存在，是第一步。而强化笼子的结实程度，则是紧紧依附于权力清单之上的“责任清单”。有权必有责，权责须一致；执法有保障，违法必追究。官员的清廉与政治的清明，正系于此。（2014年2月22日《新京报》社论）

每个公民都是道德大使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被一个温暖的故事打动。

一个来京务工的18岁姑娘，骑车时把一位76岁的老人撞昏迷。接下来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有多种变形的发生方式。然而，这位姑娘选择了一种朴素的方式——勇敢地担起责任。

正所谓善良的人，个个相似；不善的人，各个不同。她没去想要承担的责任有多大，也没逃掉以避免这些责任，而是守在老人身边等他醒来，同时哭喊着“救命”。然后陪老人上医院，两天后，她甚至辞去了工作陪护老人。

正是她的这一系列举动，感动了老人。尽管此次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但老人一家放弃追责和索赔，甚至帮她找到了新工作。

这仿佛是道德领域的“灰姑娘”故事。因为她的善良淳朴，因为她的勇于担责，最终收获了人生的芬芳。设若当初她不是这般向善的选择，那么她的轨迹可能会有多种，比如她逃逸后被找到而受到追责和惩罚，比如她的确逃过却一辈子难逃良心谴责。

评价道德与爱心，本不应当有任何功利的价值导向。任何为了收获而做的行为，都失去了原初的纯美善意。比如有的人，行善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为了获得荣誉，等等，最终都未必收获芬芳。

在某种意义上说，向善、守善、行善，所收获的芬芳，更多是内心。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美感，是帮助他人而内心充盈快乐的幸福感，是担起责任而内心有顶天立地的大写感。至于被不期然地放弃追责索赔，甚至帮助找工作这一系列的芬芳，更多的只是向善守善的“溢价”而已。

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恰恰是这种道德责任感。有了向善守善的自觉意识，一切就会变得不同。是你的责任，你勇于承担，那些因逃避责任而产生的一系列丑恶现象就不会出现。建树社会的道德规则，托举向善的力量，最需要的就是每个人的道德责任意识。你向善，就可能引起向善的连锁反应。你为恶，就可能产生道德不断滑坡的溃败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公民，都是道德大使。每个公民的选择，都是道德的标杆。

如果说，这个温暖故事的上篇是这位姑娘写的，那么下篇就是老人一家写的。是他们放大了善良的价值，呵护了向善的力量，让世人懂得了好心必有好报的朴素道理。美德就是在这样的感染与传递中不断放大。如果都有这样的良心与善意，这世上的确会少许多丑恶，多很多美好。（2014年2月22日《京华时报》兰立露）

◆史海钩沉

1977—1978年的华国锋

在目前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中，实际主政的华国锋基本隐形，面目极其模糊。从目前披露出的史料来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华国锋本人也较具改革开放的意识。那么历史的真实怎样呢？

“文革”结束后，抓经济成为党内高层的共识，但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偏重重工业，产业发展很不平衡；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非常落后，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管理方法落后，长期实行行政管理的办法管理经济，等等。高层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借鉴国外经验、技术与资金打开死气沉沉的局面。开放和改革开始一步步提上了日程。

1977年3月13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8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8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华国锋强调要解放思想：我们要经过23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

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华国锋一扫月初的谨慎态度，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亿美元，第二次180亿美元，现在有一些新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

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汇报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华国锋从加快发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进规模的扩大：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也并不保守。1977年初，项南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国锋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国锋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

1977年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期间，他很注意考察两国的经验。据朱良回忆，华国锋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随同访问的领导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1977年底至1978年，中国派了许多团出国参观访问，了解国外的大生产经验和技术设备情况，“取经寻宝”，掀起中国当代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比较重要的有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考察香港、澳门，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共工作者访问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访问反馈回来的信息强化了华国锋和高层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促使其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华国锋在听取林乎加、段云和谷牧等人汇报时给出了一系列的指示，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华国锋在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时所受到的刺激和思想变化。

访问反馈回来的信息以及华国锋与其他高层的指示直接推动了1978年7—9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讨论了引进、改革和计划等问题。这次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思想的作用。说我们的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与国务院务虚会议精神相衔接，9月5日至10月22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第一次确定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2014年2月19日《新华网》王成诚）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